

马克思主义环境观指引下的中国实践

■付磊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将生态建设上升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这一命题的背后，正是马克思主义环境观的科学指引——马克思、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论述，不仅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更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世界观与方法论。从这一理论视角出发，探讨中国如何将“和谐共生”从理念变为现实。

一、马克思主义环境观的哲学经济学基础及其生态指向

在马克思主义环境观看来，人与自然的关系有三个核心逻辑：一是“生命共同体”，人类通过劳动从自然获取能量，自然条件又反过来制约社会形态、生态问题由此成为社会发展的第一前提。恩格斯警告“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每一次胜利都将遭到自然界的报复。辩证唯物主义进一步揭示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人在改造身外自然的同时也改变自身的自然。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生命共同体，只有把生态系统完整性纳入社会再生产，人类才能获得持续发展空间；二是生态危机锚定于资本主义私有制，资本对剩余价值的无限追逐必然突破自然承受力，容易导致资源掠夺和污染转嫁；三是社会主义有先天优势，公有制能摆脱“利润至上”，让资源利用、生态保护更贴合人民长远利益。这三点正是中国生态实践的理论根基。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自然遭到系统性破坏，人类生存发展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一论断在新时代语境下重申了马克思生态批判的核心命题：尊重自然规律、在社会主义制度框架内协调社会—生态矛盾，是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根本路径。绿色转型不仅是技术或政策调整，更是生产方式和所有制结

构的深刻变革，唯其如此，才能实现生态正义与人的解放的有机统一。

二、马克思主义环境观的主要内容

马克思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发展的辩证关系，指出人在改造世界的实践中不断重塑自身，而自然界是人类劳动与生存的物质根基。水、土地、空气等自然资源，既是人类开展生产活动的前提条件，更是不可逾越的生态发展红线。历史与现实反复证明，对自然的无度索取终将招致反噬——乱砍滥伐导致水土流失、污水排放污染水体、滥捕滥杀破坏生物多样性，这些行为不仅损害生态系统，更会威胁人类自身的生存根基。唯有尊重自然规律，才能打破“破坏—反噬”的恶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然而，资本主义私有制下的发展模式，却将这种共生关系异化为对自然的剥削：资本为追求利润无限度开采资源，将生态治理成本转嫁给社会与自然，甚至让发展中国家沦为“污染避难所”，短期逐利又抑制了对绿色产业的投资，导致资源加速枯竭、生态系统失衡，发展难以维继。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上走弯路。社会主义制度为修复这种生态异化提供了根本政治基础。社会主义公有制以“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让资源利用摆脱了资本逐利的束缚，转向服务于人民的长远利益与生态福祉。通过完善生态保护立法、科学制定发展规划、出台刚性政策约束，将环境承载力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硬指标，能够统筹协调经济增长、社会进步与生态保护的关系，推动经济—社会—生态三维目标相互促进、有机统一，为实现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筑牢根基。

三、马克思主义环境观指引下的中国实践

面对全球生态危机，马克思主义环境观以科学性、实践性与全面性为特质，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清晰的世界观、科学的方法论和可行的行动路径。其深刻指出人类是自然界有机组成，绝非凌驾自然的征服者，必须遵循自然规律。这一理念奠定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论基石。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特征，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构建系统生态治理体系：从“大气十条”“水十条”“土十条”等精准治污举措，到“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还草等重大工程；从以绿色低碳发展为“治本之策”，到通过法律法规约束破坏行为，系列实践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环境观为指引，既解当下生态难题，又谋长远发展与保护协同之道，推动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形成。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等原创理念，是马克思主义环境观与中国生态实践结合的创新成果，现已转化为显著治理成效：空气质量持续改善，全国优良天数比例稳步提升，蓝天保卫战获阶段胜利；重点流域水质优良比例提高，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全国森林覆盖率达25.09%，生态系统稳定性显著增强。从理论到实践，中国生态建设既守护了绿水青山，更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刻为中国式现代化的独特标识。未来，随着绿色生产技术创新、绿色生活方式普及，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在中国征程上稳步前行。这既是对马克思主义环境观的生动践行，也将为全球生态治理提供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与力量。

（作者单位：广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儒家“政正”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四维契合性研究

■田彬彬

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儒家“政正”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核心，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虽根植于不同的历史背景，却在诸多层面呈现出深刻的相通性。这种内在契合，不仅反映出中华文化的包容性与时代价值，也从侧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何以能够在中国扎根、发展与创新的文化脉络。

一、价值立场：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

任何政治体系都必须回答“为谁执政”的根本问题。儒家“政正”思想自形成之初，便将“民”置于政治的中心位置。孟子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明确人民价值高于国家与君主；荀子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比喻君民关系，强调政权兴衰系于民心向背；孔子倡导“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主张为政以民生福祉为依归。这些论述共同构成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虽服务于当时的君主制度，却体现出对人民力量与地位的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则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旗帜鲜明地确立了人民主体地位。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无产阶级运动“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从根本上超越了以往少数人支配的政治模式。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强调，公职人员应成为社会公仆，其薪酬不得高于普通工人，防止权力异化。列宁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活力源于人民群众的创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将人民视为历史的创造者与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

尽管儒家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人民观在阶级基础和制度目的上存在本质区别，但二者均认同人民是政治的主体、历史的推动者，并将实现人民利益作为政治活动的最高标准。这种价值立场上的契合，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治理智慧的结合提供了重要接榫点。

二、实践路径：以富民发展为根基的治国方略

良好的价值立场需通过切实的实践路径来实现。儒家治国思想高度重视物质基础与

民生改善，形成以富民为核心的施政逻辑。孔子提出“先富后教”，把物质富裕作为教化与稳定的前提；孟子强调“有恒产者有恒心”，主张通过“制民之产”保障民众基本生存，进而促进社会有序；荀子则系统阐述“节用裕民”“藏富于民”的经济治理原则，指出富民方能强国安邦。此外，儒家还关注分配公正，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体现出对社会公平的早期自觉。马克思主义同样将生产力发展视为社会进步与人类解放的物质基础。马克思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进程。”恩格斯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生产不仅要满足物质富足，更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分配方面，马克思主义追求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实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从根本上消除剥削与不平等。

由此可见，儒家与马克思主义均认识到经济发展与民生改善的基础性作用，都重视生产力提升与社会财富积累，并共同关注分配正义问题。这一实践路径上的契合，使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生产力、推动共同富裕的理论，在中国文化语境中获得了深厚的观念呼应。

三、主体自律：以修身廉洁为关键的政治要求

政治主体的道德修养与廉洁程度，直接影响治理效能与社会风气。儒家强调“政者，正也”，认为执政者必须以身作则、正己而后正人。孔子指出：“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大学》进一步将“修身”视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儒家还倡导“克己复礼”“慎独”，并将廉洁品德作为胜任能的重要标准，构建起以省内自律为核心的廉政伦理。马克思主义在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中，同样高度重视纪律与廉洁。马克思、恩格斯强调党的纪律是事业成功的保证，列宁将“极严格的纪律”视为战胜资产阶级的必要条件。在巴黎公社实践中，马克思主义者明确提出防止社会公仆蜕变为社会主人的制度设计，主张公职人员由选举产生、薪酬与工人同等，从制度与道德双重层面约束权力行为。

（作者单位：青岛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山西“家风+文旅”产业融合模式研究

■李琳

代设计、叙事转化为文旅产品、文创产品、沉浸式演艺和数字内容的过程，是文旅产业开发的核心环节。

一是叙事IP化。通过“晋商诚信故事系列”“司马光家教哲理系列”等方式，形成可持续表达的文化母体。例如，在乔家大院开发“乔家大院家风密码”解谜式沉浸剧，观众在体验晋商家族兴衰过程中理解“忠以为国、诚以立身”的企业家精神。

二是产品IP化。以家风理念为灵感，开发文创产品、文化衍生品和沉浸体验产品，如“晋商算盘DIY套装”“廉洁家风香牌”等，既满足文化消费，也可增强品牌传播力。

三是数字IP化。运用数字技术构建“三晋风家风数字资源库”，将家谱、家训、家祠等文化资料数字化存储，利用AR/VR技术开发互动学习产品，如家训VR剧场、家族历史沉浸空间。

四是家庭参与式文旅体验模式。家风文化的根本属性是以“家”为主体，因此在文旅融合设计中强调“家庭参与”和“情感联结”尤为重要。

一是开发家风研学产品。针对学生群体推出“晋商家训研学营”“传统家风教育课堂”“清廉故事读读课”等，让青少年通过现场走读、情景体验增强对家风文化的理解与认同。

二是构建家庭互动体验场景。如在平遥古城设置“家庭分账本模拟挑战”，让家长与孩子共同体验晋商家庭的经营智慧；在乡村家风馆增设亲子手作区，开展木刻家训、家规拓印等互动活动。

三是打造家庭文化旅游空间。在文旅住宿业态中植入家风文化元素，通过“家风主题客房”“家训阅读角”“家风共读计划”等形式，营造学习与旅居并行的文化氛围。

（作者单位：山西开放大学）

基于SWOT分析的智慧课堂在高校思政课的应用研究 ——以新疆大学为例

■马哈力麦

价指标开展对学生的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

(一)发展困境

全媒体时代，教育者在智慧课堂模式中，凭借大数据资源、智慧算法等先进技术开展模式化教学，忽略教育主体的差异性，一味将体系化的知识灌输给受教育者，致使教育效果的弱化。

(二)发展机遇

智慧课堂在新疆大学思政课的运用为思政课建设增添了新的发展机遇，不仅体现在提供了多元化的学习交流平台，还有效实现了课堂互动的全员参与，增加教育主体之间的信任感。在智慧课堂的教学体系框架下，教师与学生均能便捷查阅各类丰富的网络教学资源，这一条件使得学生的角色发生转变，不再局限于知识的被动接收者，同时智慧课堂实现了思政课堂互动的全员参与，进一步加深了教师与学生的信任感。

(三)挑战

新媒体时代，智慧课堂所配备的系统化的线上教学模式给操作端的教师带来了一系列的技术难题。由于新疆大学思政课教师的媒介认知水平与运用水平参差不齐，部分教师无法快速适应智慧课堂体系下教师角色的转变、教学方式的创新，对媒体平台的学习与运用仍停留在探索阶段并存在技术抵触情绪，从而导致受教育者的线上信息诉求无法得到及时满足。

四、智慧课堂模式下新疆大学思政课堂的优化路径

针对当前新疆大学思政课在智慧课堂体系下面临的问题，需要从强化教师队伍数字素养、构建多元化的思政课智慧教学模式、完善智慧教学平台学习资源筛选体系等方面，推动高校思政课内涵式发展进程。

(一)定期开展技术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的数字素养

教师在运用智慧平台时，首先要树立正确的态度，不能抱有“唯技术化”的教学心态，从而丧失自身的思想独立性。部分思政课教师无法实时运用智慧教学软件开展教学，针对此类情况，学校可每周开展一次智慧教学平台培训会。

(二)着力打造多元化的思政课教学模式

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作为“双一流”学科，在过往的发展历程中开发了多个实践教研基地与调研基地，丰富多样的思政课教学基地为新疆大学形成多元化的思政课智慧教学模式提供了可能。利用新疆大学丰富的思政课实践教学资源，将智慧平台与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融合式，构建立体化的思政课教学体系，使得学生能够身临其境。

(三)构建安全、高效的智慧平台体系

新疆大学在将智慧平台投入到思政课教学中，要着重打造兼具权威性、适配性、安全性的思政课学习资源库。一方面要提高网络学习资源筛选标准，将不符合要求的资源排除在外。另一方面，学校可建立适用评估体系，抽调部分学生及教师试用初步审核通过的资源学习，并收集他们的反馈意见，根据反馈意见对资源进行重新审核与调整。教育归根到底是“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围绕学生的个性化学习需求，建立资源库更新机制。定期入库即时性的网络学习资源，有利于有效防止学生浏览参差不齐的学习资源。

（作者单位：新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大学生“考公热”趋势研究及解决路径

■刘星纓

青年的就业问题始终是热度居不下的社会议题。当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经济快速变化和行业变革，更多青年选择投身于公务员、事业单位、国企等体制内的稳定工作，“考公热”现象持续升温。

一、“考公热”的数据体现

据统计，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5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下称“2025年国考”)报名人数达325.8万人(较2024年增长约22万)，创历史新高。

然而，此次2025年国考共计招录3.97万人，较2024年仅增加160人，增幅0.4%。整体录取率为1.22%，创6年新低。其中包含个别极端案例：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岗位仅招1人，吸引16702人报名，竞争比达16702:1，被称为“万里挑一”。

二、“考公热”的行为逻辑分析

从历史脉络来看，明清时期“科举化”的命运轨迹，早已为如今的“考公热”提供了历史镜鉴。科举考试的考查形式在不断变化，但无论是唐朝的诗文歌赋，还是明清的八股文经义，这些主要考查形式的背后，都是意在为朝廷选拔德才兼备的官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内容上，围绕着“历史、才能、品德”等几大核心标准，考查官员的基本素质，将“所需之才”与“可育之才”保持高度的一致性，“学而优则仕”的选择也一直流传至今。

三、“考公热”的数据体现

工作的“稳定性”在大众眼里一般体现为：从业者不会轻易失业、行业效益不受外部经济环境影响等。尤其是当前企业的优化、裁员和倒闭潮，使得这种“稳定性”更加被珍视，故而考公被更多毕业生坚定地选择。

此外，“35岁中年职业危机”也是很多人选择考公的重要因素。见诸报端的新闻，无论是否为一些媒体抓住群体心理，博人眼球，制造焦虑的夸张叙事，中年人的职业危机都是不可避免的事实，这也使得不少人在接近考公年龄红线时，进行二次职业选择。

四、“考公热”的解决路径

个人层面来讲，解决问题的路径在于：一要有明确的自我意识。公务员的职业选择要符合自我意愿，先明确“我要”，才能够更好地付诸行动，提高上岸的成功概率。二要做足充分的心理准备。要有底线思维和系统思维，对于备考过程中极易出现的心理波动要有预设，找到应对方式。三要有合理的学习方式。考公是一场“选拔性”考试，而非“达标性”考试，本质是“优中选优”。因此，做题方式尤为重要的，以《行政职业能力测验》为例，核心策略之一在于时间管理。由于题量大、时间紧，智者并非追求答完所有题目，而是懂得权衡得失，果断放弃低投入产出比的难题，确保整体得分最大化。

(二)学校层面

学校层面来讲，高校是破除就业难的主要着眼点，优化课程设计是必由之路。大学生们对于就业的迷茫，很大原因是身处象牙塔的学校中，未与社会真正接触，在就业方面有极大的信息差。而校内课程，就应当作为连接学生与社会的桥梁。与之直接相关的，就是《职业生涯规划课程》。本课程应从选修课中“脱颖而出”，课程形式是选修，但课程内容却是人生必修。无论是从老师选择、课程设计、成果反馈都要以学生择业就业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提供全员化、全程式的就业指导，让“育才、育人”真正发挥出实效。

(三)政府层面

社会层面来讲，政府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要破局者。就业渠道和就业方式理应更加多元化、丰富化。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把促进青年特别是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其一，各级政府要压实主体责任，根据市场发展形势和各行业就业状况，迅速适应并调整就业政策，确保政策落实力度。其二，完善就业保障体系，健全均等化、数字化的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加强职业技能培训与岗位需求匹配。

总体而言，考公是个人应对市场环境变化而做出的一种就业选择，无可厚非。但“考公热”高居不下，就要注意这种趋势背后存在的就业隐患。破解路径在于，个人的清醒认识、高校的择业指导和政府的就业保障。高校、企业、政府要以问题为导向，以求职者的切身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形成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就业保障服务。

（作者单位：淮阴工学院）